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冯天瑜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第一章 孔丘的生平和思想

冯 天 瑜

- 一、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 二、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 三、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 四、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一、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10	10	10
二、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27	27	27
三、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34	34	34

第二章 孔丘的教育思想

一、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34	34	34
二、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37	37	37
三、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47	47	47

第三章 孔丘的教育实践

一、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47	47	47
二、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48	48	48
三、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51	51	51

四、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第四章 孔丘的教育思想

一、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51	51	51
二、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51	51	51
三、其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实践	51	51	51

孔丘教育思想批判

冯天瑜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5印张 80,000字
1975年6月第1版 1978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2001·150 定价0.25元

目 录

第一章 孔丘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1
一、贵族家世和反革命生涯	1
二、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立场	4
三、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9
四、反动阶级的一块“敲门砖”	12
第二章 孔丘办教育的目的	18
一、为了“复礼”而兴办私学	19
二、为了“治民”而“教民”	27
第三章 孔丘的培养目标	34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分化	34
二、“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	
——培植“守死善道”的反动分子的教育方针	37
第四章 孔丘的教育内容	47
一、以奴隶主阶级的忠、孝观念为主旨的“德教”	48
二、以诗、书、礼、乐为内容的“文教”，以射、御为内 容的体育	54
三、农、工、军、商等实际知识被排斥于教育内容之外	63
第五章 孔丘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法	70
一、“举一反三”——注入奴隶主阶级政治观念的类推教 学法	71
二、“因材施教”——为没落奴隶主阶级选“优”拔“尖” 的措施	76

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法.....79

第六章 孔丘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85

一、儒学“礼教”成为强迫人民信奉的“宗教教条”.....86

二、“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92

三、“闭门修养”办学方式的推行.....98

四、“以儒者为师”的沿袭.....102

第一章

孔丘的生平和政治、哲学思想

一、贵族家世和反革命生涯

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zōu 音邹)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是我国历史上反动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丘的祖先原是宋国大贵族，后因宋国发生内乱迁居鲁国。据《左传》和《国语》记载，孔丘的祖辈中，不少人都是“让国不授”、“执事有格”的保守分子。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武士，做过地方官(陬邑宰)，其地位已不及先辈显贵，所以，孔丘出身于一个具有保守传统，而又正在走下坡路的贵族家庭。

孔丘的老家宋国，是殷商后裔的封地，素以守旧著称。而孔丘从小生活的鲁国，则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是周朝奴隶社会各种规章制度——周礼的主要制定者，他儿子的封地鲁国成为列国中旧传统最深的国家，就不是偶然现象了。春秋末期，各国的礼乐(即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崩坏不堪，唯独鲁国却专门豢养着一批“儒”，传授西周的礼仪，研究典章文物，因此，当时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称号，各国的公卿贵族常到鲁国来“观礼”。晋国的韩宣子受聘赴鲁，看到鲁国典籍丰富、社会风俗古旧，曾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

孔丘出身于一个极端保守的贵族家庭，又生长在旧传统较深的鲁国，从小所受到的反动思想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孔丘在儿童

时代，就经常陈列俎(zǔ音阻)豆(俎、豆是祭祀时盛祭品用的器皿)，做摹仿祭祀、学习礼节的游戏^①，可见他受周礼的熏陶之深。

孔丘三岁时，死去了父亲，家境进一步衰落，所以孔丘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些自认“卑贱”的事情，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凡引自《论语》，都只注篇名），例如，他当过吹鼓手，替人办丧事；后来又做过管牛羊的“乘田吏”和记帐的“委吏”^②。

然而，当这些小官，不能满足孔丘恢复“周公之礼”的野心，于是，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他就聚徒兴学，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纠集一股反动势力，为登上政治舞台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但是，当时的鲁国，新兴封建主的力量已日益强大，孔丘的复古主张行不通，他只得跑到齐国去，向齐景公鼓吹重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但齐国是地主经济发达较早的诸侯国，许多大夫都反对孔丘，所以齐景公只得以自己年龄老了为借口，对孔丘下了逐客令^③。于是，孔丘又回到鲁国，等了十几年，仍不得见用。在这期间，孔丘继续大力从事教育活动，一些贵族子弟和其他人也纷纷投奔孔家学店，孔家学店出现了“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这一阶段是孔丘私学的鼎盛时期。

孔丘在五十岁的时候，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地方的行政长官），第三年升为司空（工程建设部长），第四年又当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并曾代行鲁相职务。这前后几年，是孔丘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但是，由于孔丘倒行逆施，受到革新派的强烈反对，摄行鲁相仅仅三个月，就被季氏等人赶下了台。

①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② 《孟子·万章》：“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③ 《史记·孔子世家》：“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丘被撵下台以后，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带着弟子到卫、陈、宋、蔡、楚等国周游，向各国公卿大夫兜售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由于他的学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十分不得人心，到处受到新兴地主阶级的谴责，劳动人民的反对。孔丘到卫国去，满想向卫灵公鼓吹“周公之礼”，哪知卫灵公不感兴趣，却要与孔丘谈打仗的事^①。孔丘大失所望，又跑去找卫灵公的老婆南子，企图用“走后门”的办法得到卫君的任用，但仍然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了忠实门徒子路的不满^②。孔丘的反动行径还激起了卫国人民群众的愤怒，为表示对孔丘的抗议，他们把孔丘坐车辗下的辙迹都铲掉了。《庄子·天运》孔丘在卫国碰了一鼻子灰，怏怏不乐地走到匡城（河南长垣一带），当地劳动人民听说孔丘这个坏蛋来了，愤怒地把孔丘包围起来，要杀孔丘，由于擅长辩说的门徒子贡苦苦哀求，才免于死。孔丘被包围时，吓得要命，但脱险以后，又夸口说：“匡人他能把我怎么样？”^③

孔丘在晚年，曾把复辟周礼的希望寄托于楚国，因为当时楚国国君楚昭王是个保守分子。孔丘在去楚国的路上，经过陈国和蔡国，被当地的封建主包围在郊外，几天吃不上饭，随从的人都饿病了（《卫灵公》）。孔丘好不容易跑到楚国，楚昭王本想用他，但遭到大臣子西等人的强烈反对，孔丘只得夹着尾巴，离开了楚国。（《史记·孔子世家》）

孔丘在列国辗转十余年，四处碰壁，其境遇正象司马迁所说的：“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史记·孔子世家》）。他到了晚年，不得不失望地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

① 《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

② 《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

③ 《子罕》：“子畏于匡。曰：‘……匡人其如予何？’。”

罕》)古代迷信思想认为,凤凰没有飞来,黄河中没有龙马负图而出,就意味着事业不能成功。他还愤愤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竟想乘木排到海外去寻找出路,这是失败者绝望的哀鸣。孔丘看到从政没有希望了,在六十八岁那年,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回到了鲁国,一方面著书立说,另一方面继续在幕后干预鲁国的政治局势,到七十二岁时,孔丘终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孔丘的一生,是顽固不化的反动派的一生。鲁迅曾以幽默的笔调,概括了孔丘的反革命生涯:“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里所说的“权臣”,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当政者,“野人”和“暴民”则是指的劳动人民,孔丘受到他们的批驳、蔑视和围攻,正说明了他站在革命人民的对立面、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当时的劳动人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是一个明知做不到,却硬要去做的死顽固^①。这是对孔丘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顽固维护奴隶制度的政治立场

孔丘生活的时代,我国正处在奴隶制度土崩瓦解、封建制度蓬勃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到了晚期,

^① 《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它的全部腐朽性已经暴露无遗，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历史前进的桎梏。当时，奴隶劳动收获的三分之二为公室（奴隶主）所占有，即所谓的“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左传》昭公三年）。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官仓的粮食堆积如山、霉烂生虫，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则挨饿受冻，许多人流落为乞丐，挣扎在死亡线上。《汉书·王莽传》记载，春秋战国时，奴隶在市场上拍卖，与牛马同栏。这些从古籍中透露出来的事实，都说明奴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与牛马别无二致。奴隶们还经常遭到肉体摧残，齐国的晏婴曾对晋国的叔向说，由于齐国公室动辄对老百姓施刑（yuè音月）刑（砍足），所以用假足的人很多，出现了“国之诸市，履贱踊贵”的现象（《左传》昭公三年），即假足（踊）因被争购而涨价，草鞋（履）却滞销削价。“履贱踊贵”，虽只寥寥四字，却是血淋淋的奴隶制度的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春秋战国的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550年，陈国有筑城“役人”的暴动，杀死监督筑城的奴隶主庆氏兄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20年，“百工”（即手工业奴隶）叛变周王室，把周王赶跑了（《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8年，手工业奴隶暴动，围攻卫庄公，庄公带着太子、公子跳宫墙逃跑，把腿摔断（《左传》哀公十七年）。春秋末期，山东一带还爆发了以柳下跖（zhí音直）为领袖的大规模奴隶起义。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队伍所过之处，“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庄子·盗跖》），给奴隶主贵族以沉重打击。跖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荀子·不苟》）。

奴隶起义的暴风骤雨，从根本上撼动了奴隶制度的统治基础，敲响了奴隶主阶级灭亡的丧钟，推动着我国社会向封建时代演进。

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冲破重重

抗礼，一再违反周礼的规定，这是地主阶级突破奴隶制度束缚的表现。例如，按周礼规定，祭祀活动中，周天子才可以用八个队列的音乐舞蹈人员，诸侯、大夫等而下之，分别只能用六个队列和四个队列。而鲁国大夫季氏，竟擅自用八个队列的音乐舞蹈人员载歌载舞（“八佾(yì音义)舞于庭”）。孔丘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越礼行为，怒不可遏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①。此外，按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登泰山祭祀天帝，然而季氏也跑上泰山祭天，孔丘对此也极为不满^②。孔丘知道，礼节上的僭越行为，是新兴封建主夺权的准备活动，是他们政治雄心的初试锋芒，因此，孔丘要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

（二）攻击“税亩”制度“非礼”。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也即孔丘诞生前43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度，以代替“井田制”。井田制是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国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完全操在大奴隶主——“王”的手里，“王”又将这些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卿大夫，这就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井田制下，土地是不许私有的。实行“税亩”制度，正式向私田收税，意味着王室和公室承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权，不再干涉土地的买卖，这样，就出现了“贵货易土，土可贾(gǔ音古)焉”（《左传》襄公四年）的局面，这当然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所以，“税亩”制的实行，无疑是一项进步的措施。然而，孔丘却对这一措施恨之入骨。他说：“初税亩……非礼也”，认为它违反了周公之礼，并攻击它“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左传》哀公十一年）。这就是孔丘对当时经济制度改革所持的态度。

① 《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② 《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三)反对“法治”，维护“礼治”。

春秋中、后期，郑、晋等国都相继实行立法改革，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晋国还制订新的法律条文，限制奴隶主贵族的某些特权，并将这些条文铸在铁鼎上面，公布于众，使贵族们不得任意改动。这就是所谓的“铸刑鼎”。孔丘对这项立法改革措施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这样一来，晋国就要亡国了。人民从鼎上的法律条文中知道了犯罪的轻重，哪里还会尊崇贵族？贵贱没有了等次，还成什么国家^①？孔丘把维护奴隶主特权的“礼治”看成立国的根本，认为“礼治”动摇了，奴隶制的国家就要崩溃。因此，他疯狂攻击“铸刑鼎”这类政治改革措施。

(四)杀害法家先驱者少正卯。

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闻人”），由于他兴办教育，大力宣传革新思想，深受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欢迎。孔丘对他早就怀恨在心，所以孔丘摄行鲁相职务以后，迫不及待地杀害了少正卯。

至于对封建主用暴力夺取奴隶主贵族的政权，孔丘更是万分仇恨。如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国国君（即“陈氏代齐”），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从没落奴隶主阶级手里夺权的一个突出事例。当时年届七十的孔丘听到这个消息，郑重其事地沐浴一番，朝见鲁哀公，请求出兵讨伐陈恒。然而，鲁哀公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的大权早已旁落到季氏三家手里，要想用兵，必须征得季氏等人的同意。因此，孔丘向鲁哀公提出讨伐陈恒的动议，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妄言而已。^②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孔丘是一个没落奴隶制度的忠实卫道者，

^①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谓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② 《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仁”，在颠沛流离时也不能违背“仁”^①。为了维护“仁”，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②。可见，“仁”是孔丘最高的理想境界，是他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东西。

孔丘关于仁的解释很多，《论语》中提到“仁”共有105次，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在答复樊迟的问题时提出来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丘说“仁”就是“爱人”。那么孔丘爱的是什么人呢？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孔丘是爱一切人。这种论断是十分荒谬的。毛主席指出：“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827页）其实，孔丘所谓的“爱人”，是指的爱奴隶主。对于“民”（指奴隶），孔丘是当做财物、牲畜看待的；对于“小人”（指其他劳动者和新兴的地主阶级），孔丘也充满了厌恶，他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就是明证。一部《论语》中，孔丘谩骂“民”和“小人”，达几十处之多。可见，孔丘决不是一团和气地爱一切人，而是“爱有等差”。他所谓的“仁者爱人”，就是企图用奴隶主相互间的爱，来加强奴隶主内部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统治、镇压“民”和“小人”。

“礼”，则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说的，指的是奴隶制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其中心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等级制度^③。孔丘认为，这一套清规戒律不可稍有违反。他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要求人们在礼的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视、听、言、动都不得越出周礼的规范。

孔丘的政治思想尽管相当复杂，但其要害是复辟，是使历史开倒车。孔丘的得意门生颜回问孔丘：“什么是仁？”孔丘说：“克己复

① 《里仁》：“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② 《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③ 《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仁”是孔丘的最高“理想境界”。他认为，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只要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归顺你的统治。孔丘还常以不能梦见制订周礼的周公而深感遗憾。可见，恢复那个腐朽不堪的西周奴隶制度，便是孔丘梦寐以求的政治目标。

哲学思想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为一定的政治思想作辩护的。孔丘反人民、复古主义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

孔丘敬畏“天命”，认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这位“天”老爷是决不可得罪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就是说，得罪了“天”老爷，连祷告都无法挽救。孔丘把畏惧天命作为君子的“三畏”之一^①。孔丘胡说，政权的存亡兴衰，人的生死祸福，完全由“天”支配。他说：“先王之道能够实行下去，是由天命决定的；不能实行下去，也是天命决定的。”^②孔丘的学生子夏说：“我听孔夫子说过：‘人的生死祸福决定于命，人的富贵贫贱决定于天’”^③。这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宿命论思想。孔丘宣扬天命观，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要他们安于被奴役的地位，不造反，不革命。

从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出发，孔丘又引伸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孔丘说：“天生德于予”（《述而》），说天老爷赋给了我孔丘治国治民的“德行”。这就把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地位涂上了一层神学唯心主义的色彩。孔丘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把奴隶主统治者的德行比作“风”，把劳动人民的德行比作“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英雄创

① 《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② 《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③ 《颜渊》：“子夏曰：‘商（子夏的名字）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在认识论方面，孔丘是先验主义者。他认为，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这种“天才”人物不需要实践，不需要学习，生来便有正确认识，而奴隶们则是“困而不学”的“下愚”。孔丘竭力通过制造“圣人生知”和“群氓无知”的谎言，为奴隶制度的“永恒”和“巩固”进行理论论证。

四、反动阶级的一块“敲门砖”

由于孔丘固执周礼，干尽了倒退复古的勾当，在春秋末期虽有少数旧贵族吹捧他，但总的说来，在那个大革命年代，孔丘的名声很臭，以挨骂居多。到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初期封建社会。孔丘的孙子孔伋（jī音及，即子思）及其门徒孟轲，进一步发展了孔丘复古守旧的政治学说，并将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但在秦朝和汉初，基本上是法家占主导地位，儒家则受到新兴封建主的抵制和批判。

汉代中期以后，儒家的处境开始发生变化。从汉元帝起，几个汉代帝王相继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和谶纬神学，孔丘也首次被追封了“头衔”，这就是“褒成宣尼公”。孔丘的儒家学说经过西汉董仲舒、南宋朱熹等儒生的加工、阐发，以及反动统治者的倡导，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孔丘这个人，也逐渐被抬到“吓人的高度”。从唐以后，孔丘被进一步追封了一系列“阔得可怕的头衔”。唐玄宗时，封孔丘为“文宣王”，宋朝封孔丘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封孔丘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尊孔丘为“至圣先师”，清朝尊孔丘为“大成至圣先师”。连孔丘的徒子徒孙也沾了光，颜回、曾参等人被迫封了各种官职，孟轲则被捧为“亚圣”，在孔庙里“配享”，与孔丘共受香火。

孔丘在生时，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反对，但是，几百年以后，却被封建统治者捧为“圣人”，儒家学派在政治界、思想界、教育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显贵地位，儒学成了帝王们的官方哲学。封建朝代虽然屡屡更迭，然而，孔丘的地位、儒学的地位却越抬越高。有人说，孔丘在汉代以后的各封建朝代，是个“不倒翁”。地主阶级对孔丘从批判变为崇拜，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然而，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它的历史任务是向奴隶主贵族夺权，打破奴隶制度的重重障碍，建立崭新的封建社会。这时，它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1088页）。因此，它必然反对孔丘的复古守旧思想。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曾把儒生骂为社会的五种害虫中为首的一种^①。但是，当奴隶主阶级被打倒、奴隶制的经济基础被铲除以后，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过去，已经确立了封建政权的地主阶级就逐渐走向反动，特别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下坡路了，这时的封建统治者，面临的历史任务，主要已经不是进行社会改革，而是强化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地主阶级的保守性和腐朽性与日俱增，“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同上）地主阶级这种历史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它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然要起变化，必然要抛弃法家的革新精神和唯物主义世界观。而那个反动、保守的儒家学说，则愈来愈投合封建统治者的口味，成了他们“用之则昌，不用则亡”的宝贝。

孔丘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一切军政命令由剥削阶级

^① 《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其带剑者，聚徒属，……。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其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

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象山语录》），公开宣称，注释儒家经书是为了阐发“我”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表露了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都是从当代的政治需要出发阐述孔学的。

在近代，反动派头目大搞尊孔活动，也是为了把孔丘当“敲门砖”使用。1914年，袁世凯演出祭孔丑剧，为他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1934年，蒋介石举行尊孔“盛典”，以配合对苏区的“围剿”，就是突出的例证。

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同样把孔丘当做打开他们“幸福之门”的敲门砖。1951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出发，也跑到山东曲阜“朝圣”。刘少奇站在孔丘这个复辟旧制的祖师爷的泥像面前，一口一个“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是圣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在1969年10月到1970年1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与自己的死党连续四次写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狂热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这样做，决不仅仅是发抒什么“怀古之幽情”。他们推崇孔丘，是为了“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页）。他们拜倒在孔丘脚下，是为了战战兢兢地请出孔丘的亡灵，借用孔丘的口号、语言和思想，去导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新场面。

正因为孔丘是我国反动阶级树立的一个头号偶像，“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所以，要革命，就一定要批判孔丘。事实上，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对孔丘和儒家思想给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明确地举起了批孔大旗。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决心起来造反时，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砸烂孔丘的牌位，显示了同旧传统决裂的大无畏精神。洪秀全还以